

网络圈群中大学生交往互动的生成机制、 价值风险与支持路径

——基于重庆地域文化情境的研究

曾婧颐¹, 魏辰谕²

¹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²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8日

摘 要

网络圈群成为大学生展开信息交流、情感互动、身份塑造和文化创造的重要场域, 促使交往出现关系聚合圈层化、表达方式符号化、情感互动即时化、价值认同流动化等趋向。现有研究大多从网络交往互动、网络圈层传播、社交媒体使用等角度展开分析, 在交往互动与网络社交、网络互动、网络社会支持等相关概念的边界辨析, 技术、需求、情感、身份与价值之间的机制整合, 以及地域文化如何嵌入网络交往过程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将网络圈群中的大学生交往互动理解为一个由技术嵌入、需求驱动、符号互动、情感联结、身份认同和价值协商共同构成的动态过程。数字技术为交往提供条件, 兴趣、情感和归属需求促使圈群聚集, 符号互动和在线支持加强关系黏性, 身份认同和价值协商推动信息交往转化为意义共同建构。重庆方言、山城空间、两江文化、地方生活方式等地域文化资源, 通过平台传播、青年再创造和群体互动嵌入大学生网络交往, 为其提供地方性符号、情感记忆和身份协商资源。与此同时, 算法推荐、流量逻辑和圈群同质化也会带来信息认知碎片化、情感互动依赖化、圈群边界封闭化、数字身份表演化和价值判断情绪化等潜在风险。网络圈群在促进大学生自我探索、社会支持和文化创造的同时, 也可能造成认知封闭和价值极化。因此, 需要在尊重大学生主体性和网络文化创造力的基础上, 从提升数字交往能力、推进高校网络教育融入圈群、优化平台环境、完善多主体协同支持机制等方面, 为大学生网络交往提供支持。

关键词

网络圈群, 大学生, 交往互动, 价值认同, 网络教育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Value Risks, and Supportive Pathways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actions in Online Communities

—A Study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Chongqing Regional Culture

Jingyi Zeng¹, Chenyu Wei²

¹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²School of Tourism and Media,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ugust 1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8, 2026

Abstract

Online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spa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interact emotionally, construct identities, and create culture. These communiti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several trends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of relational clusters, the symbolization of modes of expression, the immediacy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fluidity of value identification. Existing studies have mainly examined thes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nline group-based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use.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clarify the conceptual boundaries between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 online interaction, and online social support; to integrate the mechanisms linking technology, needs, emotions, identity, and values; and to examine how regional culture is embedded in online interaction.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college students' interactions in online communities as a dynamic process jointly constituted by 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 need-driven particip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emotional connec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value negotiation. Digital technologies provide the conditions for interaction, while needs for interest, emotion, and belonging motivate the formation of online communities.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online support strengthen relational cohesion, wherea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value negotiatio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into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including the Chongqing dialect,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untain city, the culture of the two rivers, and local lifestyles—are embedded i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interactions through platform-based dissemination, youth-oriented recreation and re-creation, and group interaction. These resources provide local symbols, emotional memories, and resources for identity negotiation. At the same time,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raffic-oriented logic, and homophily within online communities may generate potential risks, such as fragmented information and cognition, emotional dependence, closed group boundaries, performative digital identities, and emotionally driven value judgments. Although online communities facilitate college students' self-exploration, access to social support,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they may also lead to cognitive closure and value polarization.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respect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ity and their capacity for online cultural creation while providing appropriate support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interaction competencies,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into community cultur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latform environ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support mechanisms.

Keywords

Online Communities, College Students,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Value Identification, Onlin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技术深入到大学生交往方式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短视频平台不仅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技术工具,还是大学生情感表达、关系建立、自我展现、价值判断形成的重要场所。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经历、情感需求、地域归属感、价值取向等产生不同的网络圈子,使网络交往从广结朋友变为相似的圈层聚合。

网络交往不是现实交往在数字媒介的简单延伸,而是交往主体以信息、情感、观念等作为内容,采用数字符号实现意义分享、精神联系、价值交流的活动。网络交往以数字连接为依托,体现人的精神需要和交往关系在网络空间中延伸[1]。网络交往在拓宽主体关系、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会带来价值共识弱化、价值认同减损等风险[2]。

网络圈群为认识这种交往形态提供了具体的关系结构。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改变思想信息传播空间,信息呈现圈内集中、圈际区隔和跨圈流动并存等特征,这种现象与网络关系中的兴趣相似性和同质性聚合密切相关。网络圈群内部较高的互动频率和情感黏性在增强群体归属的同时,也可能因成员兴趣和观点的相似性而形成同质性交往,进而减少成员接触异质信息的机会[3]。技术赋权使青年的自主表达、内容生产、社会参与等能力得到提升,但平台规则、算法分类、数据逻辑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交往对象及表达方式。

需要对网络社交、网络互动、网络社会支持与交往互动等概念进行区分。网络社交主要强调个体借助数字平台建立和维持关系的行为事实,关注交往对象、交往频率、媒介使用和关系规模;网络互动主要关注交往过程中的信息交换、符号回应和行为反馈;网络社会支持则强调个体通过网络关系获得的信息帮助、情感回应、经验分享和归属感。相比之下,交往互动不仅包括关系连接和信息交换,还关注主体如何在持续互动中形成情感联结、确认身份、解释经验并协商价值。

从分析层次看,网络社交回答的是“是否建立了联系”,网络互动回答的是“联系如何展开”,网络社会支持回答的是“联系产生了何种支持”,而交往互动进一步关注“主体如何在联系和互动中形成对自我、他人、群体和生活的理解”。因此,交往互动包含信息交往、情感交往和观念交往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信息交往提供共同经验和讨论材料,情感交往形成信任、共情和关系黏性,观念交往则推动身份确认、意义解释和价值协商。

本文使用“交往互动”描述网络圈群中的关系连接、情感交流和意义协商过程,不预设交往结果必然具有积极意义,也不把某种特定价值结果作为交往成立的前提。网络圈群中的互动既可能产生开放、合作和支持性的关系,也可能形成排斥、封闭和极化性的关系,具体结果需要结合平台机制、圈群结构和主体实践进行分析。

交往互动概念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价值。其一,能够把技术条件、主体需求、群体关系和意义形成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解释网络圈群如何从信息连接发展为具有情感黏性的关系结构。其二,能够揭示网

络交往的深层影响,即平台不仅影响大学生“与谁交往”和“如何表达”,也影响其如何认识自我、理解他人和形成价值判断。其三,能够连接网络传播研究、青年文化研究和教育支持研究,为分析网络圈群中的身份形成、文化创造和价值协商提供中介性概念。

国内外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网络交往的两面性。一方面,在线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性平台的使用以及黏结型社会资本同大学生心理健康密切联系[4];另一方面,在线支持可能会由于错失恐惧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产生网络依赖[5],社交媒体疲劳、网络欺凌与心理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6]。国内研究大多从交往的价值属性和意识形态效应入手,国外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和心理健康出发,两者之间缺少对技术条件、主体需求、群体互动、价值结果的综合分析。

重庆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方言表达、山城空间、两江文化、地方生活方式等都可能成为大学生网络交往的符号资源。将重庆置于地域文化情境中,不是把一般大学生研究结论直接套用到重庆学生身上,而是考察地方文化怎样通过数字平台和青年群体的再创造,应用到大学生的情感表达、身份认同与价值协商过程中。基于此,有必要从生成机制、价值风险、支持路径三个方面来考察网络圈群中大学生的交往互动。

2. 网络圈群中大学生交往互动的概念边界与理论视角

(一) 网络交往互动的内涵——从行为连接到意义建构

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社交主要是考察交往的频次、使用的媒介、关系的多少以及行为的方式等,而网络交往更注重的是在互动背后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意义的创造以及价值的塑造。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第一层是以知识、事实、经验为主的信息交往;第二层是以倾诉、陪伴、共情、支持为主的情感交往;第三层是以意义解释、立场表达、价值判断为主的观念交往。

这三个层次不是相互独立的。信息交往给精神互动创造基本内容,情感交往产生持久互动的动力,观念交往促进个体互动向身份认同、价值协商靠近。只有当网络互动不再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关系维持,而上升到情感理解、意义交流、观念建构等深层次,才体现出交往的深刻内涵。

这三个层次并非彼此分离。信息交往为情感交流和观念讨论提供材料,情感交往为持续互动提供动力,观念交往则推动个体关系向身份确认和价值协商发展。网络互动只有超越单纯的信息传递和关系维持,进入情感理解、意义解释和观念讨论层面,才形成较为完整的交往互动过程。

数字媒介并非让身体退场,而是以语音、影像等符号化形式使其重新在场。交往主体始终是具身的,身体并未被技术中介所取消,而是经由媒介技术以新的方式参与感知与表达,技术改变着身体感受与情感真实性的呈现机制,而非否定情感本身[7]。这就意味着网络交往既有虚拟性又有现实情感、社会影响。

(二) 网络圈群的结构特征——从临时聚集到关系共同体

网络圈群是指个体依靠数字平台,以共同兴趣、相似经历、情感共鸣或者价值认同为纽带,通过不断的互动、符号共享以及群体的规范来维系的一种关系共同体。它不是一时的网络围观,也不是有明确制度边界的正式组织,具有关系聚合化、边界弹性化、语言符号化、价值偏好同质化等特点。

网络圈群为大学生降低了寻找同伴、建立关系的成本。个体可以借助兴趣标签、推荐机制以及群组功能,很快进入到有着相同偏好的群体当中,在不断的互动之中产生认同感。圈群边界虽然具有流动性,但内部符号、价值取向也会产生一定的排他性。圈内成员通过共同话语、兴趣偏好和互动规范确认群体身份,并在持续的关系维系和情感交流中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与归属感[8]。

网络圈群回答了交往发生于何种关系结构之中,交往互动则关注这种关系结构如何产生情感联系、身份确认和意义协商。网络圈群并不必然产生深层次互动,只有当成员在信息交流的基础上建立情感联

系,并围绕身份、经验和价值展开协商时,圈群才可能从关系集合发展为具有共享规范和共同记忆的关系共同体。

(三) 交往互动的分析框架——由技术连接到价值协商

现有研究分析了数字技术、在线支持、圈层传播、价值认同的作用,但是很少说明不同的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网络圈群里大学生交往互动不是由单一的心理因素或者技术因素决定的,而是技术结构、主体需求、群体关系、文化环境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技术嵌入-需求驱动-符号互动-情感联结-身份认同-价值协商。

数字技术为大学生进入网络圈群创造条件,兴趣、情感需求是参与的动力,网络符号、互动仪式形成群体边界,在线社会支持加强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不断互动使群体归属变成身份认同,最后对大学生的意义理解、价值判断产生影响。该过程不是线性前进的,算法推荐、商业逻辑、群体压力会作用到各个环节上,从而产生有积极的赋能作用和消极的交往异化现象同时出现的情况。

这一过程不是彼此分离的线性过程,而是不断循环和相互反馈的转化过程。技术嵌入提供交往发生的可能性,但只有同大学生具体的兴趣、情感和归属需求结合,才会转化为稳定的圈群参与。需求驱动形成参与动力之后,成员需要借助方言、表情包、网络梗、影像风格和话题标签等符号确认“我们是谁”,从而实现由个体参与向群体归属的转化。符号共享提高了交往的可识别性和情感密度,并在点赞、评论、私聊、互助和共同创作中推动弱关系转化为情感联结。情感联结只有经过持续参与、群体回应和身份比较,才会转化为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形成后,又会反过来影响成员的信息选择、符号使用和群体边界维护。最终,成员围绕生活经验、群体规范和公共议题展开讨论,情感共鸣才可能转化为价值协商。

地域文化并不是上述机制之外的静态背景,而是通过“符号资源-情感记忆-身份协商-价值表达”嵌入交往互动过程。重庆方言、山城景观、两江文化、地方饮食和城市生活方式首先以网络语言、影像、表情包和话题标签的形式进入圈群,成为成员识别彼此和建立联系的符号资源;这些符号与共同生活经验结合后,进一步承载熟悉感、陪伴感和地方情感,形成群体的情感联结;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在使用、学习和改编地域符号的过程中,形成对地方身份和城市生活的不同理解;当成员围绕城市记忆、地方文化保护、城市发展和公共责任展开讨论时,地域文化又进入价值协商过程。

地域文化不会直接决定大学生的网络交往方式,而是经过平台传播、青年选择、符号改编和群体互动后,转化为情感认同、身份意义和价值表达。算法推荐、商业流量和群体压力可能在各个阶段发挥放大或阻断作用,使地域文化既可能成为促进交往和文化创造的资源,也可能被压缩为适合流量传播的单一标签。

(四) 数字社会与算法中介视角下的网络圈群

网络空间并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虚拟场所,而是由技术架构、平台规则、用户实践和社会文化共同构成的关系空间。数字平台具有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可扩展性和可搜索性等特征,个体的表达、身份展现和群体聚集由此获得新的可见性[9]。网络圈群正是在这种网络化公共中形成的关系集合,其边界既由成员的兴趣和情感建构,也由平台标签、推荐机制和内容可见性规则不断塑造。

“算法中介的公共”视角进一步说明平台并非只是呈现已经存在的群体,而是通过数据分类、推荐排序和可见性分配参与群体的形成。平台根据用户浏览、停留、点赞、评论和转发等行为,为用户推送具有相似主题、情绪和偏好的内容,由此形成参与、反馈、再推荐、进一步参与的循环[10][11]。同时,平台社会的商业逻辑和公共价值也深刻影响着圈群的生成与演化[12]。算法中介一方面帮助大学生发现兴趣伙伴、获得社会支持和参与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可能压缩接触异质观点的机会,使兴趣边界逐渐转化为认知边界。

青年亚文化和参与式文化研究则有助于解释圈群符号、风格与文化创造的意义。青年并非数字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模仿、改编、拼贴和再传播参与文化生产[13]。网络圈群中的方言、表情包、网络梗、影像风格和话题标签,不仅是降低沟通成本的工具,也是大学生进行自我表达、群体区分和文化创造的方式。重庆地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是被动呈现的对象,而是经过大学生选择、改编和再创造后进入网络交往。

3. 网络圈群中大学生交往互动的生成机制

(一) 技术嵌入——圈群交往的媒介基础

数字平台的可连接性、可见性、可互动性、可存储性打破了传统交往的时空束缚。大学生可以通过评论、转发、群聊、直播以及共同创作等方式参与到网络互动中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交往的对象。数字平台消解了现实空间的限制,个体不再局限于地缘、业缘关系,能够基于兴趣偏好自主联结,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群体内部的内容生产者与关系建构者,拓展了青年群体的表达与参与空间[14]。

但技术不是中性的交往工具。算法依靠用户的浏览、停留以及互动纪录来判定用户的兴趣偏好,不断推送相同的内容,表面上是大学生在自主选择圈群,实际上他们的选择也被平台的分类以及流量的分配所影响。网络圈群是由主体选择和技术筛选共同作用形成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网络圈群并不是完全由用户自主选择形成的,也不是平台单方面制造的,而是主体选择与技术筛选共同作用的结果。平台推荐既可能帮助大学生发现兴趣同伴和文化资源,也可能通过重复推送强化既有偏好,影响成员接触异质信息的机会。

(二) 需求驱动——兴趣满足与情感支持

共同兴趣是大学生形成网络圈群的主要动力。学习、游戏、动漫、影视、体育、社会问题以及地域文化等兴趣标签降低了交往对象的识别成本,使得个体很快就能找到有共同话题的成员。兴趣相似性提高互动效率,也为情感交流奠定基础。

大学生处在自我探索和角色转变的重要阶段,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焦虑以及发展不确定性可能使其产生陪伴、理解和归属需求。网络圈群可以提供经验分享、情绪回应和同伴支持,在线社会支持也可能促进积极心理资源形成[15][16]。但当个体主要依靠圈群反馈确认自我价值时,情感支持也可能转化为持续在线和错失恐惧。兴趣拓展和情感支持共同形成网络圈群交往的动力。

(三) 符号互动——圈群意义的共同生产

网络圈群一般都有特定的称谓、表情包、网络梗、话题标签。符号既能压缩表达成本,又承载着群体的记忆、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个体只有理解并使用圈群符号,才能获得成员身份并进入到内部意义生产的过程之中。

符号互动使网络交往从一般的交流变成共享的意义建构。成员借助共同使用某种话语表达群体经验,还会对符号的含义加以解释,形成群体的规范。但高度符号化的表达会简化复杂问题,使事实讨论被标签和立场所取代。符号既是交往的媒介,又是意义封闭的边界。

(四) 情感联结——由弱关系接触到群体黏性

点赞、评论、转发给个体带来被看见、被回应的情感体验,私聊、群体互助、共同参与形成稳定的感情关系。社交媒体使用是否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果,并不是仅仅由使用强度决定的,还会受到使用目的以及关系质量的影响[17]。

情感联系把散乱的网络关系转变成群体黏性。成员一起经历、互相帮助而产生信任感,网络圈群从兴趣集合变成有归属感的关系共同体。但情感联结也会加大群体压力。当维护圈群的情感成为首要目的时,成员会压抑不同的意见,把理性讨论变成立场维护。

(五) 身份认同——从群体归属到自我确认

大学生不断参加圈群活动、运用群体符号并遵照互动准则,把“加入某个圈群”变为“成为某种人”。圈群成员的回应就如一面数字化的“身份镜”,个体在别人评价时会改变自己的呈现方式,用和圈外群体的差异来强化自我认知。

网络身份具有多重性,给大学生自我探索提供空间。但若当个体过分依赖群体认可,自我表达就会变成迎合圈群期待的身份表演。真实自我、理想自我与平台化自我之间距离增大,交往就会从主体间的理解变成对流量、认同的追求。

(六) 价值协商——从情感共鸣到观念形成

交往的深层次结果是价值协商。大学生在互联网圈群中除了分享信息和情绪外,还会就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等问题进行讨论。典型叙事、情感互动、边界划定产生的内部价值秩序,在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会对成员价值判断造成影响。

圈群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事实核验、理性讨论,价值协商可以产生反思性的认同。当圈群把内部立场绝对化、排斥外部观点时,价值协商就会变成立场的加强。交往能否达成意义共融,主要看群体认同是否保持开放性,大学生是否具备独立判断和跨圈交流的能力。

4. 网络圈群中大学生交往互动的积极作用与潜在风险

(一) 促进大学生自我探索

网络圈群为大学生提供了低成本、多样化的自我探索空间。大学生可以围绕专业选择、兴趣发展、审美偏好、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进入不同圈群,通过观察他人、展示自我和接受反馈,尝试不同的身份表达。网络空间的可选择性和一定程度的匿名性,能够降低部分学生进行自我表达的心理压力,使其在多重身份之间进行比较、调整和整合。

网络圈群对自我探索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成员完全脱离现实关系和社会规范。健康的圈群应允许成员保留差异、表达不确定性和进行适度试错,而不是要求成员始终保持统一风格和立场。需要支持大学生认识到点赞数量、粉丝规模和圈内认可并不等同于自我价值。

(二) 促进青年文化创造和地域文化再生产

网络圈群不仅传播既有文化,也为大学生进行文化创造提供了条件。大学生通过短视频、图像设计、方言表达、网络写作、音乐改编和城市叙事,将校园生活、地方经验与流行文化重新组合,形成具有青年风格的文化产品。参与式文化研究指出,青年并非数字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模仿、改编、拼贴和再传播参与文化生产。

重庆地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城市景观,也可以成为大学生讲述生活、表达情感和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素材。圈群中的文化创造可能产生文化创新、地方认同和社会参与,但也可能受到平台流量偏好的影响,被压缩为景观化、娱乐化和消费化的内容。

(三) 算法中介与圈群边界的双重效应

网络圈群的形成并非完全建立在大学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之上,也受到算法中介的持续影响。推荐系统通过分析浏览、停留、点赞、评论和转发等数据,为用户推送具有相似主题、情绪和偏好的内容。大学生越是参与某一圈群,平台越可能依据其既有行为继续推荐同类信息,形成参与、反馈、再推荐、进一步参与的循环。

平台并非只是呈现已经存在的群体,而是通过数据分类、推荐排序和可见性分配参与群体的形成。算法中介一方面帮助大学生发现兴趣伙伴、获得社会支持和参与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可能压缩接触异质观点的机会,使兴趣边界逐渐转化为认知边界。

(四) 信息碎片化削弱深度认知

网络平台偏好简短直观、有情绪刺激的内容,复杂、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很容易被压缩成标签、片段和立场。大学生长时间处在高频切换的信息环境当中,会产生快速浏览、即时判断的认知方式,无法对同一个问题展开持续深入的精神交流。信息量增多并不一定就能使认识能力得到提升,反而会造成信息过载、社交媒体疲劳。网络泛娱乐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18]。

碎片化传播会割裂事实的历史背景和因果联系,造成大学生在信息不完整时做出价值判断,信息交往也就不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理性的观念交往。

(五) 在线支持转化为情感依赖

网络圈群可以缓解孤独,但即时反馈会使得大学生把持续在线和关系安全联系起来。一些学生经常去查看群消息、平台动态,生怕漏了消息或者被排除到群体之外。在线社会支持由此可以变成由于错失恐惧而产生的依赖行为。此外,问题性在线行为和网络社交依赖也可能由此产生[19]。

网络社交依赖挤占学习、休息、现实交往的时间,也会使个体在处理现实关系方面的能力下降。当自我价值依靠圈群评价时,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情感的排斥,理性讨论也会变成人际间的冲突。

(六) 同质性交往造成认知封闭

网络圈群是以兴趣相同、观点一致为基础,在提高沟通效率的同时,但是也会使成员接触不同的信息的机会变少。算法推荐与选择性接触互相加强,成员不断地被同化到原有的立场之中,把圈内的高频观点当作社会共识。

当圈群的身份和价值取向高度相关联,意见分歧容易引发群体间的冲突。圈内传播具有很强的黏性,圈际传播存在阻隔性,这些都会加大高校正确价值观进入特定网络圈群的难度。其风险并不在圈群的自身存在上,而在圈群的边界是否压缩了跨群体交流、公共讨论的空间。

5. 重庆地域文化情境下大学生网络交往的具体表现

(一) 巴渝文化为圈群互动提供地方性符号

重庆方言、山城空间、两江文化、码头记忆、饮食文化等,赋予了大学生网络表达有辨识度的地方性符号。方言、城市景观、共同的生活经验减少本地青年之间的交流距离,地域身份成为网络圈群联系的纽带。

地方文化不会直接决定大学生的交往方式,而要经过平台传播和青年群体的再创造。大学生对于地域符号的选择、改编和传播,形成文化归属与城市认同,也会把地域符号简化成娱乐化的标签。巴渝文化进入网络交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地方文化资源经由数字化表达变成情感记忆和身份意义的过程。

(二) 城市媒介形象强化地域身份的可见性

短视频、社交平台造就了重庆有视觉辨识度的城市网络形象。重庆大学生既是城市媒介形象的接受者,也是地方文化内容的生产者。通过拍摄城市景观、说方言、分享校园生活、参加地方话题等方式把日常生活经验变成可以传播的城市叙事。

该种表达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地域归属感,但平台流量偏好会把复杂的重庆文化压缩成景观、饮食、网红城市等标签。地域文化如果只是停留在视觉消费上,就不能真正地进入到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中去。从景观传播走向历史记忆、公共责任和城市共同体认同,这是重庆高校引导网络交往需要重视的问题。

(三) 多重身份交叉增加交往的复杂性

重庆高校学生除了地域身份外,还有学校身份、专业身份、兴趣身份、家庭身份、价值立场等多重身份。不同生源地、学校类型、成长经历的大学生对于巴渝文化以及重庆城市形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重庆本地学生会把地方文化当作生活经验,外地学生会通过网络媒介以及校园生活来慢慢形成对重庆的

认识。

因此不能用抽象的地域性格来解释重庆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地域文化是交往产生的一种情境变量,要同平台使用、圈群类型、个人经历、校园环境一起加以分析。其主要意义就是给不同的身份的大学生提供可以共同参与、协商的文化资源。

6. 网络圈群中大学生交往互动的支持路径

(一) 提升数字交往能力, 支持主体性发展

大学生网络教育不能只停留在防沉迷、辨谣言和遵守平台规则的层面,还应支持学生发展信息辨识能力、情绪调节能力、价值反思能力和跨圈交流能力。高校可以围绕算法识读、信息核验、情绪识别、冲突沟通、隐私保护和数字表达开展实践性教育,帮助大学生分辨事实、观点、情绪和商业营销,养成信息溯源、事实核验和多元比较的习惯。

数字交往能力的核心不是减少大学生的网络表达,而是使其能够自主、理性、负责任地表达;不是要求学生退出网络圈群,而是帮助其在圈群参与中保持独立判断、跨圈交流和自我调节能力。网络教育的重点不应是替代学生进行判断,而应为其提供必要的信息、工具和讨论空间。

(二) 进入圈群文化实践, 推进意义共创

网络圈群具有不同的话语方式、情感结构和互动规范,统一化、单向度的教育内容较难获得成员认同。高校网络教育可以由圈群外部的信息发布转向圈群内部的意义共创,根据学习、文体、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和地方文化等不同社群的特点,开展分众化的数字素养教育、心理支持、文化创作和公共议题讨论。

高校可以与学生兴趣社团和校园创作者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支持学生参与议题设置、内容生产和群体沟通。围绕学业发展、职业选择、情感关系、公共参与和地方文化等学生真实关切设置讨论情境,将教育内容转化为大学生能够理解、参与和协商的生活话语。

(三) 优化平台环境, 扩大用户自主权

网络圈群的潜在风险并非由大学生个人单独造成,也与平台算法、互动功能和流量逻辑有关。平台应提高推荐规则的可解释性,增加用户对推荐结果的调整、屏蔽和反馈权,适当提供跨主题、跨地域和跨观点的内容选择,避免单一热度指标决定公共议题的可见性。

对于高冲突、高情绪内容,可以设置事实核验入口、延迟转发提醒和理性讨论提示,但不宜简单地删除和封禁替代沟通与教育。技术治理的目标应是提高用户理解和使用平台的能力,而不是将大学生塑造成被动接受规则的对象。

(四) 完善支持体系, 促进线上线下关系衔接

网络依赖、情绪极化和攻击性表达的背后,可能存在孤独、焦虑、归属感不足和现实支持缺失等问题。高校可以建立由心理教师、辅导员、专业教师、学生社群骨干和朋辈志愿者共同参与的支持体系,为大学生提供方便、可信并尊重隐私的咨询和求助渠道。

对于受到网络欺凌、长期处于负面情绪或存在严重网络依赖的学生,应优先采取倾听、陪伴、关系修复和现实支持等方式,而不是简单进行纪律性训诫。通过社团活动、志愿服务、学习互助和线下实践,可以帮助学生将网络关系转化为现实交往和社会参与。

网络圈群已经成为大学生开展信息交流、情感互动、身份探索、文化创造和价值协商的重要关系结构。其生成并不是单纯由技术推动,也不是大学生个体需求的自然结果,而是技术嵌入、需求驱动、符号互动、情感联结、身份认同和价值协商共同作用的过程。数字技术拓宽了交往范围,兴趣聚合降低了关系形成的门槛,在线支持提升了群体归属感,符号互动和身份认同促使一般的网络社交转化为意义交

流与共同建构。

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网络圈群既能够为大学生提供自我探索的空间、社会支持的资源和文化创造的机会,也可能在算法推荐、流量逻辑和同质性交往的作用下,造成信息碎片化、情感依赖、认知边界收缩、身份展示压力和价值判断情绪化。因此,不能将网络圈群简单视为风险来源,也不能预设其必然形成积极的关系共同体。其实际影响取决于平台技术结构、圈群互动方式、大学生数字能力、现实支持网络和地域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

重庆地域文化为大学生网络交往提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符号资源和情感基础,但这种影响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经由数字平台以及青年群体的选择、改编和再创造形成。重庆高校应尊重大学生的网络表达、文化创造和关系选择,在提供必要信息、心理支持和数字能力培育的同时,减少单向度的外部规训,推动地方文化、青年网络表达、校园生活和城市公共实践相结合,使网络圈群成为大学生开展自我探索、社会支持和文化创造的开放空间。

基金项目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具身认知视角下重庆大学生网络空间精神交往研究”(S25YGG2070026)、重庆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重庆大学生网络空间精神交往的生成机理、评价指标与优化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张瑜, 蒋婷婷. 网络空间精神交往: 本质内涵、生成动因与价值意蕴[J]. 教学与研究, 2024(12): 58-68.
- [2] 蒋婷婷. 论网络空间精神交往的实践样态、价值困境与有效引导[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5): 78-87.
- [3] McPherson, M., Smith-Lovin, L. and Cook, J.M.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415-444.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27.1.415>
- [4] Jiang, Y., Chi, J.M., Wang, L. and Geng, X.M. (2023)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BMC Psychology*, **11**, Article No. 277.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23-01324-x>
- [5] Liu, C. and Ma, J.L. (2020) Social Support through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Current Psychology*, **39**, 1892-1899.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8-0075-5>
- [6] Cao, X.F., Khan, A.N., Zaigham, G.H.K. and Khan, N.A. (2018) The Stimulators of Social Media Fatigue among Students: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7**, 1083-1107. <https://doi.org/10.1177/0735633118781907>
- [7] 刘海龙, 束开荣.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7(2): 80-89.
- [8] Ellison, N.B., Steinfield, C. and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43-1168.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67.x>
- [9] Boyd, D. (2010)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Networked Publics: Affordances,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In: Papacharissi, Z., Ed.,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Routledge, 39-58.
- [10] Gillespie, T. (2014)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 In: Gillespie, T., Boczkowski, P.J. and Foot, K.A., Eds., *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The MIT Press, 167-194.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9042.003.0013>
- [11] Bucher, T. (2018) *If...Th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0493028.001.0001>
- [12] Van Dijck, J., Poell, T. and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0889760.001.0001>
- [13] Jenkins, H., Ito, M. and Boyd, D. (2016)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a Networked Era: A Conversation on Youth, Learning, Commerce, and Politics*. Polity Press.

-
- [14] 罗自文. 网络趣缘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传播模式研究——基于 6 个典型网络趣缘群体的实证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4): 101-111.
- [15] Xia, M. and Liu, J. (2023) Does WeChat Use Intensity Influenc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hrough Social Use of WeChat, Entertainment Use of WeChat, and Bonding Social Capital?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1**, Article 1167172.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3.1167172>
- [16] Ye, S. and Ho, K.K.W. (2024) Would You Be Healthier If You Had More Social Capital? Focusing on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Media Use in Japan. *BMC Psychology*, **12**, Article No. 776. <https://doi.org/10.1186/s40359-024-02278-4>
- [17] Papacharissi, Z. (2014)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999736.001.0001>
- [18] 仰义方, 陈沛珊. 网络泛娱乐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2(4): 86-92.
- [19] Kircaburun, K., Kokkinos, C.M., Demetrovics, Z., Király, O., Griffiths, M.D. and Çolak, T.S. (2018) Problematic Online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and Emerging Adults: Associations between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17**, 891-908. <https://doi.org/10.1007/s11469-018-9894-8>